

# 思考未来：历史哲学的时间尺度

张文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 历史哲学是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沉思。人们对于未来命运不确定性的探索与尝试,由来已久。不同的古代文明中,巫术、神话与宗教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16-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的影响下,哲学家们开始了大规模探索人类发展规律的思考,维柯、孔多塞、康德、黑格尔等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然而在追求永恒真理的过程中,这些思想体系始终存在无法克服的逻辑矛盾。对于科学理性有限性的认识,使得如别尔嘉耶夫、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等思想者提出,只有在信仰中,才能克服有限与永恒、现实缺陷与完美性追求的矛盾。20世纪的科学进展表明,“世界终结”确实存在,完美性的设想没有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以接受认识有限性与存在局限性为前提的。“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这句经典论断表明,对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关注,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与生命力所在。未来是人们积极行动创造的结果,而非哲学与宗教思辨的产物。

**关键词:** 未来; 历史哲学; 有限性;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2018)01-0145-08

**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18.01.015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曾说,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科学。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表述。不同时代人们对于时间理解的差异,常常影响着他们的历史观念并塑造着历史学的风格。以中国传统史学为例,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似乎是对勒高夫之言的一个很好注解,强调历史学应当建立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有机联系。古罗马作家西塞罗也有一句名言,“历史乃生活之师”。这句常被视为代表西方传统史学信条的名言,同样表明了对于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认识。

倘若更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在司马迁与西塞罗的经典表述中,共同缺少时间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未来。这种现象并不难以解释。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命运,是理性思考难以展开的领域。随着16-17世纪西方世界近代科学的兴起,人们对于自身有了更大自信,未来随之被纳入到各类学科的讨论中。历史学也不例外。

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一大显著区别,便是要处理好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的关系,而非仅仅前二者。更为严格地说,将未来纳入框架的是一种被后来称为“历史哲学”的新领域。这是一种以探讨人类命运发展规律为目标的新科学。

## 一、巫术、神话与宗教的尝试

人们对于未来命运不确定性的探索与尝试,其实由来已久。如20世纪出土的数量庞大的中国甲骨文表明,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占卜便在预测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方面,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占卜之前,人们将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需要询问的事情通过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甲骨的相应部位便会呈现出裂

收稿日期: 2017-03-08

作者简介: 张文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纹。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例如，一则有代表性的卜辞记载，某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王后妇好自告奋勇，请求率兵前往。商王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得吉兆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

在希腊神话中，诸神之一的太阳神阿波罗能使人们获知有关宙斯的思想，因而通过预言而传达的阿波罗的信息，就为人类的事务提供了神圣的指引。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便是有着广泛影响的占卜场所之一，它的预言和指示，都深刻地影响了希腊的文化和历史。公元前547年的一则预言说，吕底亚国王克罗伊索斯(Croesus)若跨过哈里斯河，就将摧毁一个伟大的国度。克罗伊索斯这样做了，结果他为波斯人击败——果然有一个帝国毁灭了，就是他自己的帝国。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似乎提供了德尔菲神谕灵验的另一个经典故事。据传，古忒拜国王拉伊俄斯曾在德尔菲神庙祈得神谕，他的儿子将来会犯下弑父娶母的罪孽，因而将其新生的婴儿遗弃于山谷中。因牧羊人获救的俄狄浦斯，最终在一次意外的争斗中杀死拉伊俄斯，破解了斯芬克斯的谜语，被选为忒拜国王。按照习俗，俄狄浦斯迎娶了失去丈夫的王后，也就是他的母亲伊俄卡斯忒，应验了德尔菲“弑父娶母”的神谕。

无论是中国的甲骨占卜，还是古希腊德尔菲的神谕，提供的毕竟只是对个别具体事项的神学预测，尚缺少对于人类未来普遍命运的系统性思考。较早迈出这一步，并对后世有广泛影响的，是古代波斯人琐罗亚斯德(628BC-551BC)。出身于贵族家庭的琐罗亚斯德对传统多神教加以改革，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

琐罗亚斯德教将世界看成是一场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并据此将世界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每阶段3000年，共12000年。在第一阶段中，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创造了精神世界。第二阶段，阿胡拉·马兹达与恶魔阿赫里曼在物质世界战斗。阿赫里曼杀死了原牛，原牛的骨髓产生了植物。后他又杀死原人，其尸体化为金属，其种经提纯后保存，孕育了人类最初的一对男女始祖，并繁衍了人类。但人类受到恶神的引诱而堕落。第三阶段，依照善神的意志，琐罗亚斯德诞生，标志着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第四阶段，琐罗亚斯德教将广传世界，琐罗亚斯德的第三子将于此阶段末降生，

成为“义”的化身，他将率众彻底清除恶魔，取得最后的胜利，引导人类进入光明、正义与真理之国。

与中国商朝甲骨占卜和古希腊的德尔菲神谕有所不同的是，在琐罗亚斯德教这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不必完全受神秘莫测的天意摆布和无情命运的支配。在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斗的战场上，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愿望，在针锋相对的两大势力之间进行选择，决定取舍。这就为人的自由意志留下了空间。尤为重要的是，琐罗亚斯德教提出了“世界末日”概念。末日到来时，人们将因各自不同的行动取舍而有着不同的归宿。“真诚、善良者将在天国享受阿胡拉的恩典和光辉，虚伪、邪恶之徒将跌落阿赫里曼黑暗的地狱。”<sup>[1]</sup>琐罗亚斯德教的末世论思想，被犹太教与基督教继承并逐步加以改造，成为近代西方历史哲学重要的思想资源。

将神学、哲学与历史思考融于一炉的，首推希波的神父奥古斯丁(354-430)。奥古斯丁生活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青年时期曾习摩尼教，对于希腊哲学有相当深的研究，最终在对于基督教经典的阐释与反思中，完成巨著《上帝之城》。而促使他从事对人类历史命运沉思的直接原因，则源于一次历史事件。公元410年8月，哥特人在国王阿拉利克的率领下攻陷被基督徒称为永恒之城的罗马，大肆洗劫三天，并纵火焚烧了部分地方。这次事件在帝国上下引起强烈震动，在基督徒心中引发了一场信仰危机。同时代的教父哲学家哲罗姆曾惊叹道，如果罗马能够毁灭的话，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安全呢？奥古斯丁则坦承，其对上帝之家的向往由此被点燃，并推动他去捍卫上帝之城，反对攻击者的指责和歪曲。

在奥古斯丁看来，罗马的毁灭这一事件本身只是表象，深层的道德堕落才是帝国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一段著名的议论中，他写道：“(罗马)的毁灭是在罗马城墙还屹立着的时候，而不是在她遭到洗劫之后。因为，城墙的毁坏是石头和木头的坍塌，而罗马的毁灭是由于他们的荒淫。这里坍塌的不是城墙，而是这座城市的道德品质，他们心中燃烧着的欲火比焚烧他们房子的烈火为害更甚。”由此，他逐步认识到真正的永恒之城不可能是属地的，只能是属灵的上帝之城。他把人类分成两个序列，“一个序列由那些按人生活的人组成；另一个序列由那些按上帝生活的人组成。象征性地说，我把这两个序列称作两座城，亦即人类的两个社会，一个预定要由上帝来永远统治，另一个要与魔鬼一道经历永久的惩罚。”<sup>[2]</sup>

## 二、科学革命影响下的探索

如上所述，在漫长的前现代科学时代，尽管人们对于未来有许多思考，但是这些思考总体而言是零星的，也是不系统的。历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始自16-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以后。可以说，正是科学革命的巨大影响，刺激了人们对于人类命运进行全新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非凡成就。在无数科学领域有影响的大人物中，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与伊萨克·牛顿（1643-1727）是两位佼佼者。

作为实验科学的鼻祖，培根的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标志着一种新思想与新方法的诞生。培根为之设定了一个不同于宗教的目标，就是改善人们生活。而所采用的方法，就是科学归纳法。培根采取的做法是借助一种布置井然的实验程序，从感官出发为人类的理解力开辟道路。用他的说法就是，“我们必须把人们引导到特殊的東西本身，引导到特殊的東西的系列和秩序；而人们在自己一方面呢，则必须强制自己暂把他们的概念撇在一边，而开始使自己与事实熟悉起来。”培根进一步对这种方法做了解释：“真正经验的方法是首先点起蜡烛，然后借蜡烛为手段照明道路；这就是说，它首先从适当地整列过和类编过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随心硬编的经验或者漫无定向的经验出发，由此抽获原理，然后再由业经确立的原理进行至新的实验。”<sup>[3]</sup>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科学归纳法。被誉为历史哲学之父的意大利人维柯（1668-1744）说，培根在学术领域中俨然像庞大帝国的政治领袖，“指明我们应该如何开拓新艺术和新科学，来增进我们已有的艺术和科学；我们应该如何耕耘我们现在已有的学科，使人类的智慧能够臻于完善。”<sup>[4]</sup>

伊萨克·牛顿万有引力公式的发现，则是科学实践取得成功的一个辉煌典范。按照科学叙事的经典说法，牛顿是受到一个苹果落地的启发，进而归纳出统治万物的万有引力定律。其后的科学观测，证明了牛顿力学的确实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培根与洛克所倡导的经验性方法的可行性。但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牛顿的天才发现，是科学史上一个令人难解的谜题。不过，牛顿定律向人们表明，培根所向往的原理或者规律，在这里有了确定性的表述。维柯的雄心是要创建一种人类社会的科学，这种科学在“民族世界”这个主题上，要做到伽利

略和牛顿等人在“自然世界”所取得的成绩。在《新科学》出版后，维柯曾经向牛顿寄出，以期获得这位科学巨人的认可。孔多塞（1743-1794）的目标是使社会科学——他称之为道德科学——具有同实验科学一样的确定性。孔多塞从数学借用分析方法，向自己提出要研究迄今被置于科学领域之外的一个新的研究对象：政治和社会现象。针对可能的质疑，他反问道：“如果说人们能够以几乎完全的确凿性来预言他们已经知道了其规律的那些现象，如果说即使是它们尚未为人所知，他们也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以很大的概率预见到未来的事件；那么为什么以某种或然性，根据人类历史的结果来追踪人类未来命运的史表，就应该被看成是一桩虚无缥缈的事业呢？在自然科学中，信仰的唯一基础乃是这一观念：即驾驭着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乃是必然的和不变的；然则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于人类思想的和道德的能力的发展，就要比对于自然界的其他活动更不真确呢？”<sup>[5]</sup>

一种对未来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的进步史观，在维柯与孔多塞等人那里，得到了较为清晰的表述。如前所述，维柯试图运用培根的方法，实现对人类世界的牛顿式理解，他称之为“新科学”。这门科学的最高原则是，“包括所有各民族的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sup>[6]</sup>并且，既然民政社会的世界由人类创造，人们希望而且也能够认识它的原则。在考察历史上的不同制度后，维柯将直接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与人的时代。在神的时代人们相信他们在神的政权统治下生活，神通过预兆和神谕向他们指挥一切。预兆和神谕是世俗史中最古老的制度。在英雄时代，英雄们在贵族政体下统治着，他们自以为比平民具有优越性。在人的时代，一切人都承认自己在人性上是平等的，因此建立了民众或民主的政体。在维柯这里，不同民族的人民都是走在通向平等的道路。

孔多塞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十个时代，前九个时代截至他所生活的年代，第十个时代是对未来的展望。在他看来，历史乃是人类理性的不断解放，从自然环境的束缚中解放，从历史的束缚中解放，总体呈现为一个进步的过程。他对第十个时代表达了三种希望：废除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一个民族内部平等的进步、人类真正的完善化<sup>[5]</sup>。根据以往的历史以及科学推理，他认为，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是无限的。“除了自然界把我们投入在其

中的这个地球的使用寿命而外，就没有别的限度。”人类精神在解脱了所有枷锁、摆脱了偶然性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以后，将“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sup>[5]</sup>。

正是在进步主义思想的激励下，启蒙时代的哲人们自信地提出了许多改良社会的方案。如圣西门（1760-1825）直接宣称：人类理性的进步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政治问题的最重要论据已经可以并且应当从高级科学和物理科学方面获得的知识产生出来。出于对牛顿的狂热崇拜，他认为：“物理科学和精神科学的一般理论，都可以建立在万有引力观念的基础上，万有引力是神用来支配和管理宇宙的规律。”他还用上帝显圣的口气说：“我已经把牛顿安置在我的身边，我委托他教育和指挥一切地球上的居民。”<sup>[7]</sup>

作为启蒙时代最伟大哲人之一的康德（1724-1804），一方面如同时代的人那样，对于历史普遍规律充满希望，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在1784年《普遍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中，康德写道：“历史学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并且就以这种方式而把从个别主体上看来显得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禀赋之不断前进的、虽则是漫长的发展。”<sup>[8]</sup>

对于揭示普遍规律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康德本人曾尝试给出回答，认为人类这个物种的命运是一场走向完美状态的进步。但他可能对自己的回答并不十分满意，否则不会将尝试进行回答的论文命名为《人类历史起源臆测》。所谓臆测，意在表明证据和逻辑尚不足以支撑其观点。在《万物的终结》一文中，康德对于“未来”问题作了进一步讨论。在康德看来，即使我们以最好的标准接受人类命运的道德-物理状况，亦即持久的进步并趋近于至善，这个过程依旧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持续进步本身同时意味着对无限系列灾祸的一种展望。唯有达成终极目的，才能实现我们的全部禀赋和最终愿望。因此，人们期待着世界有一个终结，并通过此赋予行动的历史以终极价值。“万物终结”导致的结论之一，也是时间的终结。终结不是不复存在，而是从此转化为一种没有变化的绵延，或者用康德的话说——永恒状态。在康德看来，处于永恒状态的绵延是指我们无法形成任何概念并与时间无法加以比较的一种数量。所以他谦虚地表达了自己的热

望：我们是否可以成功地找出一条这样一部历史的线索，而留待大自然本身去产生出一位有条件依据它来撰写这部历史的人物。大自然就曾产生出一位开普勒，开普勒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使得行星的偏心轨道服从于确切的定律；大自然又曾产生过一位牛顿，牛顿便以一条普遍的自然原因阐明了这些定律<sup>[8]</sup>。

或许正是意识到康德道德进步说中的矛盾性，以及面对无限未来的困惑，黑格尔（1770-1831）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策略反思历史，这就是区分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在黑格尔看来，凡是在自然界里发生的变化，无论它们怎样地种类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为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才有新的东西发生。因而，世界历史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精神泯没于自然之中。第二个阶段就是精神进展到了它的自由意识。虽然与自然状态分离，但是片面的、不完全的。第三个阶段是从特殊的自由形式提高到了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世界的最后目的，就是绝对精神的客体化。

按照黑格尔的解释，精神的历史只是在说明一种可能性。而要使其获得现实性，其工具与手段便是各阶段最广义的人类活动。这些阶段的各种形态是世界历史上的各种民族精神，就是它们的道德生活、它们的政府、它们的艺术、宗教和科学的特殊性。一旦将历史理解为世界精神在各地的展开与实现过程。黑格尔便将世界各地历史剪裁为各个精神的发展阶段：如中国是非历史的历史，中亚是少年时代，希腊世界是青年时代，罗马国家是壮年时代，日耳曼世界是老年时代。老年时代是精神的完满和成熟<sup>[9]</sup>。

诚如恩格斯所言，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理念，那么在实践中也一定能够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问题是，也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样一来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康德一样，黑格尔也在对人类完美状态的哲思中陷入自相矛盾。

### 三、理性的限度与宗教学家们的新思考

如果回溯启蒙时代这些哲人们的智力成就，我们会发现20世纪的许多指责并非全然虚妄。卡尔·波普在二战期间完成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部著作中，对于进步观念提出批评，认为人类未来的命运受到知识支配，知识是不确定的，因而未来也是不确定的。我们既可以写一部进步的历史，也可以写一部衰落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以自然科学为范式的人文社会科学，患上了一种被哈耶克称之为“唯科学主义”的通病。哈耶克说：“唯科学主义观点不同于科学观点，它并不是不带偏见的立场，而是一种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它对自己的题目不加思考，便宣布自己知道研究它的最恰当的方式。”<sup>[10]</sup>这种看法可以说触及了启蒙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要害。具体来说，这个时代的历史哲学对于科学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一是没有认识到培根科学方法的局限性，二是没有认识到牛顿经典力学的局限性。考虑到后者更大的影响力，我们可以先从后者说起。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牛顿被视为神一般的存在，经典力学被视为支配宇宙万物的普遍性原理，这种对于科学的片面性认识，使人们误以为最高的普遍性原理是容易获得的。然而以今天的眼光看，全然不是事实。人们现在知道，宇宙中有四种基本的力：万有引力、强核力、弱核力与电磁力。万有引力只是其中一种。即便是在对这四种力有很多了解的基础上，科学家们还是没有能够建立可以统一解释的最高原理。即便如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子，耗费数十年时间思考统一场理论，也并未解决这个问题。换言之，牛顿力学的统一性，只是特定力的统一性。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量子力学的发展，人们发现在微观粒子世界，经典力学并不起作用，粒子是以概率的方式，而非确定性的方式存在。牛顿力学的普遍性，也只是局部范围的普遍性。那种激励人文社会科学的完美性信念，是一种不成熟的信念。

在方法论层面，尽管培根倡导的科学归纳法仍旧在广泛使用，但人们也逐步认识到，正如牛顿力学存在条件性与局限性一样，培根的科学归纳法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培根的方法，从认识论角度来说，是典型的科学还原论方法。这种方法认为，通过对于事物局部性认识的逐步累积，可以达到对于整体性的把握。用培根的话来说，即首先要认识初级原理，然后逐步认识中级原理，最终是认识最高原理。尽管培根对最高原理保持着高度审慎，但他对于这种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总体的认识过程是高度自信的。圣西门的门徒们曾对于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提出过批评，指出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归纳需要假设作为先导，而这种假设是无穷的；二

是归纳所考察的事实，始终是有限的。由于以上二者，科学归纳法始终是有限性归纳，对于认识整体性与连续性是不够充分的<sup>[11]</sup>。不得不说，圣西门主义者的看法非常敏锐。

20世纪，一种被称为突现论的理论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所谓突现论，强调事物的整体有着不同于部分的独特性质，因而难以通过无限细分的还原方法加以认识。举例来说，物理学中，水分子由2个氢原子与1个氧原子构成，但无数水分子的结合却可以有三种基本的存在形态：液态、固态与气态，各种形态都有不同的物理特性。在生物学中，每一只蚂蚁的生理结构都是简单的，但蚁群的特性无法从单只蚂蚁的特性得到解释。在社会学中，个体的思维与行动，要受到其他个体的影响与干扰。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类关于集体组织原理的系统性研究，通常被称为系统科学。系统复杂性的问题，成为挑战科学研究的艰巨课题。人们提出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混沌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各种理论。这些理论使得人们对于诸如宇宙、生命、社会等复杂性巨系统的运行与变化有了更多新的认识。

总体而言，启蒙时代哲人们为未来设定的目的论秩序，总是不免要假定在有限时间内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历史于是表现为进步的与目标实现的过程。而在另一方面，未来的无限开放性则似乎成了吞噬理性的黑洞。这一难以克服的矛盾，使得完善、真理、平等、自由等启蒙理想变得黯淡了许多。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更使得前几个世纪的进步观念，不过像是人在青春时代的一种盲目自负。正是此背景下，一些宗教历史哲学家们加入了讨论的行列。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1871-1948）将时间区分为宇宙时间、历史时间与生存时间三种形式。他认为，宇宙时间可理解为一种圆周运动的不断轮回，早晨与黄昏、春天与秋天的轮番更迭便是其表征。历史时间不同于自然时间，是一条向前无限伸展的直线，它自身永远不会终止，永远朝向那种不能进入永恒的无限性。历史终结与世界终结的问题，不仅哲学不能严肃审视，甚至神学也不能严肃审视。人若要脱出在历史时间中的被奴役感，只能有两个出口：或者朝向宇宙时间，或者朝向生存时间。前者的循环不能令人满足，走向生存时间是唯一的选择。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生存时间象征着点，是一

种较宇宙时间与历史时间更加深刻的时间。它是一种内在的、主体性世界的时间，而不是外在的、客体性世界的时间。生存时间意味着历史向精神自由王国的过渡。这个精神自由不同于黑格尔精神自由的自我认知、民族精神和绝对理念。黑格尔将广义的人类活动看作实现精神自由的工具和手段，而别尔嘉耶夫则认为诸如国家、社会、民族、教会等方面理想的或现实的等级秩序，是客体化世界，是对人的奴役，是实现精神自由的障碍。人从历史时间向生存时间的突破，是上帝与人的联合行动。不仅经由忏悔和赎罪，同时经由积极的行动，自由王国才能来临<sup>[12]</sup>。

如美国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这样对于理性有限性与历史时间有限性有着深刻洞见的神学家而言，启蒙理性的历史解释有着极大的缺陷。他认为人的生存统一性既从属于又超越于自然进程，剥夺超越性不能使其返回自然，而抹掉从属性也不能使其上升到永恒。这是人类生存的最后谜团，除了信仰与期待，没有别的解答。因为所有的回答均超越了人的理性的疆域。可是假如不找到这些回答，人的生活就会受到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危险，还会受到盲信与骄傲的侵扰。无论何种状况，都会以失败收场。

尼布尔认为，理性主义者所犯的一个永久错误，就是不承认理性的有限性与罪性，就是要从这种对理性的信赖中去获取普遍的理性法则。以为人能够通过逃避历史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或历史进程就能够解决那些问题，这样的错误观念是人的妄自尊大。而历史进程凭自身固有的力量并不支持从混乱走向秩序。为人类的自由建立更崇高复杂的秩序，也不免包含着更严重的混乱的危险。每当有新的善产生，就会有新的恶同时出现。尼布尔说，既然没有办法使历史彻底摆脱重大利益的相互冲突（战争），也无法避免旨在防止这些冲突发生而确立的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暴政），就要争取更高层次的正义，就是要在有限性的历史时间中与神的永恒性建立联系，以信仰来获得最高的正义<sup>[13]</sup>。

在他们背后，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奥古斯丁的身影。既然理性无法为现实世界设想出一种完美秩序，信仰似乎是触手可得的便捷出路。

#### 四、时间的限度与人的积极存在

美国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曾说，在通往哲学思

考的路途中，科学家常常是路标的设置者。在思考历史哲学时，这句话大概同样适用。我们知道，对于许多启蒙思想者与神学家而言，未来无限性的假定已成为其理论思考无法解决的内在缺陷。事实上，这一假定并不成立。

根据 20 世纪宇宙学、物理学、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我们对于宇宙中大尺度的时间年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大约 137 亿年前，宇宙诞生。大约 45 亿年前，地球出现。不超过 700 万年前，我们人类的远祖——人亚科原人出现。未来大约 50 亿年后，太阳将衰老为红巨星，逐渐死亡。这个大尺度的时间地图，或许其科学性还会因科学的发展而进一步提高，却为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哲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如果太阳系、进而地球是有寿命的，无论是 50 亿年或更加遥远，仍将会为人类历史的进展设定边界。人类历史只能在这个时间尺度中展开。“历史的终结”将不再是一个哲学观念或宗教观念，而变成一个科学观念。其次，既然“历史的终结”是一个科学观念，不论我们多么不情愿，充满自由意志的历史过程最终将戛然而止。换句话说，人类在历史终点处实现种种自由或善的完美设想是不成立的。终结既不是一个理想的实现，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破灭。我们已经不得不被迫接受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缺陷性，也还将不得不接受群体命运的有限性与缺陷性。再次，如果历史是一个确定有始有终的过程，还会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进程么？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未来是确定的么，是值得期待的么？许多学科在为之付出努力。如热力学第二定律似乎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如同自然一样处在不断熵增的过程中。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则进一步说明，即便大时间尺度中的熵增，也不妨碍非独立系统远离平衡状态下形成自组织，从混沌中依旧能产生秩序。历史学家当然也不是旁观者。如“大历史”的倡导者大卫·克里斯蒂安认为，人类未来可区分为三个阶段：大约 100 年左右的近期未来，尽管是复杂与不确定的，但也不是任意的，存在着可以用科学模型进行预测的种种趋势；中期未来，超过一百年之后的漫长时间过程中，要真正预测人类这个物种几乎是是不可能的；远期未来，生物圈的最后命运取决于地球和太阳的演化，终结不可避免。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历史的终结不可避免，如同个体的生命不可避免走向衰亡一样，人类更应该关心的问题或许不应当是历史何时终结，而应当问问：我们

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活得如此久远？至少在当下，宇宙的演化仍旧超出人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但人类却可能因为环境破坏与互相杀戮等自身原因而随时面临灭顶之灾。

只要简要回溯以往神话、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论述仍有着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恩格斯引用了歌德的名言“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后，猜想了有机生命的消失与地球的死亡。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评价黑格尔的历史观时，再次写道：“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研究这种看法是否完全跟自然科学的现状相符合的问题，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距离社会历史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远，我们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sup>[4]</sup>这段论述说明，恩格斯已经充分注意到宇宙时间的科学尺度对于历史观念可能造成的影响。承认未来的有限性，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展开论述的必要前提。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认识的有限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没有如以往宗教与哲学那样试图将其看成一种“终极性的真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写道：“我们决不需要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地都不是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括大量的认识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末，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即使真正的动机并不像在这里那样是要求承认个人的没有错误。”<sup>[5]</sup>以这种辩证的思维看，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便存在着内在的自我矛盾，“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

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这是和辩证法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sup>[5]</sup>

不仅人们的认识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指出，历史过程永远不会出现完美的理想状态，每个特定阶段都具有暂时性。“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作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sup>[4]</sup>对于认识有限性与历史局限性的承认，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以往一切对于人类历史的研究，有着根本性区别。

在经典作家看来，过去对于历史规律的讨论存在的另一大共同问题，是以“臆造的联系”代替了“现实的联系”。“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sup>[4]</sup>

因此，正如恩格斯所言，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以“现实的联系”替代“臆造的联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强调：“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sup>[5]</sup>故而，“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

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sup>[15]</sup>历史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因而，马克思的“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sup>[16]</sup>这句重要断言，包含着唯物史观中两个重要的基本内容，一个是批判性的，一个是建设性的。批判性的方面，是提醒人们要避免在时间中的“消极存在”。因为对于认识有限性与历史局限性的认识不够，也没有从现实的联系出发，过去的宗教与哲学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常常不是将人们导向上帝，就是将人们导向虚无。建设性的方面，便是号召人们以行动去改变世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创造新的生活。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其意便在于此。在他们看来，“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sup>[15]</sup>

按照这种理论，对于现实的人生存状况的关注，才是历史哲学的生命力所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命运是人们用自己的双手与智慧创造的，未来如何，取决于我们当下的行动。

#### 参考文献：

- [1][伊朗]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阿维斯塔[M].元文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3.  
[2][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下册)[M].王晓朝,译.北京:

- 人民出版社,2006:51、632、926、932、935.  
[3][英]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M].许宝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7,60.  
[4][英]利昂·庞帕.维柯著作选[M].陆晓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4.  
[5][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M].何兆武,何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76,177,2、204.  
[6][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623-624.  
[7][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M].董果良,赵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5,23.  
[8][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3.  
[9][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110-115.  
[10][英]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6.  
[11][法]巴扎尔,安凡丹,罗德里格.圣西门学说释义[M].王永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1-77.  
[12][俄]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M].艾彦,译.北京:学林出版社,2002:168-175.  
[13][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M].王作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563-567.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3,213,242.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0,421,574,307,423.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2.

## Reflecting on the Future: the Time Dimens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ZHANG Wen-tao

(The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Abstrac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focuses on the fate of humankind. In different ancient civilizations, myths and religions offered their own explanations. Influenced by European scientific revolution of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philosophers have put forward many systems, all of which, however, have logic contradictions. Recognizing the limi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some thinkers have even claimed that it is only in faith that we can expect to overcom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emporality and eternity and that between the imperfect reality and our pursuit of perfectio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has proved that “the end of the world” is a real possibility, toppling the base for the assumption of a perfect world. Marxism accepts the limitation and imperfectness of humankind, claiming that “time is the positive existence of mankind”. The future is the creation of positive human activities, not the outcome of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meditation. Marxism is still a scientific system.

**Key words:** Future; Philosophy of History; Limitation; Marxism

[责任编辑:李蕾]

[责任校对:马瑞雪]